



——评瑶族诗人唐德亮诗作

□石英

## 开阔的诗境 巧妙的诗艺

唐德亮是我相识很早却见面较晚的一位诗人,是我在心中赏赞已久的、年纪尚轻的“老”同志。也就是说,在个人的交往上纯粹是君子之交,但在精神的融合和作品的相知上却可以说是很深很深。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其作品的特色体现在思想锐敏、角度犀利与诗的意象的创造性等方面。作为一个作家、诗人,他正直而有良知,有着虽不张扬却执著难移的定力和勇于担当的优良品质,由此闪射出人性的光芒。他在诗歌创作上不仅注意思想的发现和哲理的锋刃,还积极进行新诗艺术的探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首先,其诗作体现了诗人开阔的社会人生情怀,以及作为一个真正诗人应有的责任担当。作为一位在粤西北瑶族山区长大的诗人,唐德亮非常热爱家乡的一切:山川风习、朴厚乡风等等。为此,他甚至以差不多整本诗集抒写了瑶乡,但他的视野和情怀绝不囿于那一块、那一族的狭小天地。一种挚热的天性诗人的担当,使他具备一种纵览历史与视通万里的眼光。很多诗作都体现了他驰骋万里的眼光和情怀:“我骑在大山的脊梁/与群山一起奔跑……”瑶山是他诗思的出发地,对于一位神思无垠和敢于承担的诗人而言,“奔跑”的脚步永远不会止息,思想的触角也永不会被磨平,责任的担当也永不会卸肩。即使他写的是寻常的物象,也常常被诗意地加以提升,如“风将牛角吹醒/牛角将生命唤醒”(《风将牛角唤醒》),“牦牛以它的影子及舌头/证实高原冬天与春天同时生长”(《牦牛群》)。即使他写“穷人”,也不是一味哀怜,也不是简单地愤而仇富,而是旨在张扬人间和社会的公平平等,且从未忽略人的精神、人格骨气:“骨肉是硬的/每一座大厦/都要用他们做奠基”。

再者,在注重诗境的开阔的同时,唐德亮也积极地进行深刻的诗艺挖掘,在诗境的开阔与诗意的纵深两个方面兼备。

上世纪50年代,王肯老师创作了一首叫《鄂伦春小唱》的歌曲:“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呀一匹猎马一呀一杆枪,獐狗野鹿满山遍野打也打不尽。”歌曲以强劲有力的旋律、生动形象的歌词,非常准确地传达出了鄂伦春人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品格。而现在,作家诚然怀着对鄂伦春族的深情与热爱、理解与尊重,以史诗般宏阔的豪迈叙事,用他的小说《白那恰》为这个淳朴善良的民族谱写了一曲优美的生命赞歌。

清光绪年间,鄂伦春一个部落,为了离开流行天花的穆民,在首领莫日根的带领下,开始了漫长的逃亡。时光流转,经历了无数灾难,终于完成了一次次迁徙。小说描写的就是迁徙途中发生的故事。通过一个部落的兴衰,全面展示了鄂伦春民族的传奇历史。作者避开了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把历史、传奇放入日常的现实,在每一天实际的日子里完成叙述,与那些激烈地表达仇恨与杀戮的作品相比,更加具有亲和力。作者像一个沉稳老到的画家,将鄂伦春人那一幕幕看似平常却又像一串串亮闪闪的互相关联的珍珠似的故事,连缀在一起,绘出一幅幽深淡雅极富禅意的唯美画卷。

很多人都曾被大型原生态歌舞演出《云南映象》所打动,那种未经俗世污染、最接近生命本真的原始与纯粹,非常令人震撼。而小说《白那恰》中所保持的那种原始粗粝的状态,那种来自森林山野的毛茸茸的触感,是“云南映象”在文学上的另外一种表达。这种原汁原味的小说,真是特别珍贵,它不矫揉造作,不要花拳绣腿,朴素平实地讲述着它的故事,如出水芙蓉般的清丽。

作者对于鄂伦春族的了解与认识,不是普通的熟悉,而是一种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融合。书中的整体气象、语言风格、民俗民风民情,都非常有特点。如果不看作者简介,你一定会以为这是鄂伦春人自己写的作品,作者如神灵附体般地进入到了鄂伦春人的生活,也进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触摸到了他们的灵魂,这使他的作品像是从他们身上生长出来的自然天成,完好地再现了鄂伦春原始部落的生存状态,抒写出在那个时代里属于这个民族的心灵史。

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小说中

深刻,不可能没有揭示。历史与现实都是真实的存在。只有不涂抹与遮掩旧时的污血,才能更正确地掂估解放与拯救的真正分量。在《伐竹》一诗中,作者是这样写的:“竹与风为敌,不断鞭打隐形对手/直到累弯了腰”。其实在我的理解中,竹与风“为敌”是迫不得已的被动行为。但凡正义的抗争,往往也需要付出代价,有时这代价还是很沉重的。而在《旧时的牛》这首诗中,作者说:“这春天被牛的舌头收割之后/又探头探脑地从地底冒出/而那牛一旦装进人类的胃/就再也无法与春天亲吻”。

在唐德亮的诗作中,类似的例证可谓不胜枚举。他作诗从不甘肤浅,更不属于浮皮蹭痒来堆砌无聊的文字。深刻,这是有别于浅薄乏味之作的鲜明标识,但要做到深刻也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有深刻的思想,有高明的表达功力,才有诗意深刻之作。

再次,唐德亮诗作中一直渗透着鲜明的爱憎,这源于他骨子里非同一般的崇善与痛恶的感情倾向。这一点,固然与前二者有关系,但我仍愿单独提出,只因为它是作者诗作中突出的要素。

“莫道石头冥顽苍老/一旦刻上神秘的经文/便仿佛有了神经/石头就不再是石头了/我不信神/但我相信石头敲击的火花/是远古最动人的光芒”。(《高原的石头》)诗中浸润着对质朴的同情和爱意,同时鄙视那些卑俗的势利之徒。

“当我看见/当我看不见/我依然感受到/这世界即使在夜晚/也有阳光与幸福/在人世的头颅上生长”(《当我看见》),对人间世间的一切真善美,有一种爱之甚烈的深情。“真善美”这三个字,虽已被用得太多,却仍然难以用别的词语替代,正因为诗人对其爱得太深,便对与之相反的东西憎恶有加,如在《族长秘史》中所揭示出的人世丑行。

如此说来,真正的诗人也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一个真善美的无愧的代言人,要有一颗炽热的爱心,也要有一颗痛恨邪恶的凛正之心。真正的好人,后天的环境熏陶固然非常重要,先天的基因也不能说全无意义。作为一个诗人,写出真正的好诗就是做好事。

孔子说,听其言观其行。我认为真正的、感情真挚的诗不同于一般的“言”,不是一般的口号,而是发自肺腑的“心之声”,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既是言也是行。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爱国英烈,他们的诗词与他们做人的“行”就是一致的。岳飞、文天祥、辛弃疾、陆游是这样,于谦、林则徐等也是这样。唐德亮的诗作也是一种真诚之作。

唐德亮在诗歌艺术方面不断探索和创新。可以说,在新诗创作中的一些常见的表现方法他多运用圆熟,而且在实践中也有奇招显现。但奇而不怪,变而不离谱,创而不失其美。例如,“两片厚厚的嘴唇/一旦发言/便有结实的稻米/成了齑粉”。(《石磨》)意象变形之后,力度遽然增大,或许就连事物的性质也有所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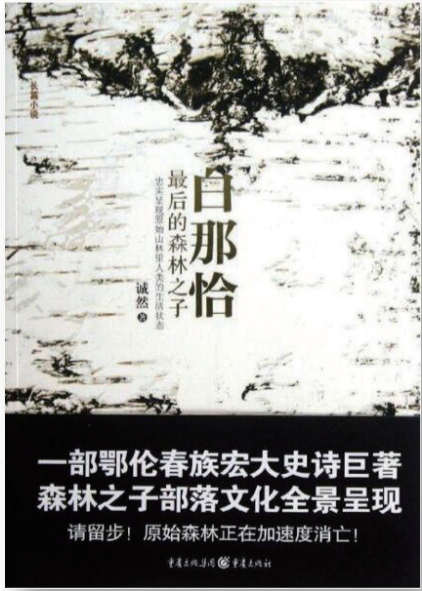
“这是什么样的镜子/被天空挂起又被天空遗弃/惨白的颜色/被水浸淫被水击碎”。(《水中月》)面对传统的意象,诗人仍会依据环境的变化、感觉的不同,赋予其新的含义。

“夜风将虫声传到天涯/不断散落那一片片带露的叶尖/被虫声染亮/那虚寂的天空被虫声充满”。(《虫声》)微不足道的昆虫,诗人以通感等手法加以揉调,便使树叶乃至天空有了亮色,也不再那么空寂。足见诗意的大小、质量与现实中的物象不是完全同一的概念。

“栽一株玉米于浅土/荒凉中的叶片/摇曳着单调的春天/喂养着瘦弱的温饱”。(《石灰岩山区》)四句诗即浓缩了粤北山区土层的贫瘠与吝啬。诗人对词语的巧妙组合突显了艺术的张力。这些诗句的可贵之处在于:从生活的真实面看来是不忍目睹的;而从诗歌的艺术上看,却具有耐人咀嚼的美质。

## 质朴书写鄂伦春族的历史

——读诚然长篇小说《白那恰》 □宣 儿



又勇敢地承担起这个重任,率领族人顽强游走于森林山野之中。作者把内心深处最柔美的感情及对女性的美好愿望毫无保留地倾注在吉若身上,使她在书中的形象特别光彩夺目。

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始终把自己隐在幕后,把舞台交给小说里的人物,表达他们的欢乐与悲伤。那种无我之境的随意、物我两忘的老庄思想、充满禅意的象征和隐喻时时弥漫在字里行间。

书中关于鄂伦春族独特风俗的描写,比如:水葬、树葬、骨卜、记事绳、抓嘎拉哈等,除了故事和情节的需要,还极具历史、人文、民俗学等重要价值。

由于鄂伦春族生活在大小兴安岭地区,所以书中除了鄂伦春语,还有很多东北方言,这些幽默风趣的东北话,使小说语言更加形象生动,像夹杂着雪花的旋风扑面而来,清新、鲜活,对于表现人物性格特别有效。叙事也是这样,几个动词就能够把一个场面或事情交代清楚,且活灵活现,极富动感。很多场景充满了画面感,有的地方写得特别有感觉和味道。如,“代苏荣在沟塘的深草里走得很快,在过草塔头的时候,枯草那么密,那么高,他在一个塔头上轻松地跳跃着。那又是一种力量的蹂躏,当他踏过之后,草塔头上的枯草都被他踏出一个个深坑。”文字非常含蓄优美。

一些微小的细节可看出作者非常注意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比如这段描写:“树洞口烂木桩上挂了一层白霜,这准是熊喘气形成的。”

作者在后记中说,从2000年就开始准备这部作品了,除了查阅大量资料,几乎走遍了北方分散在各地居住的猎民乡村,采访了百余位鄂伦春族老人。从2005年写作第一篇,到2010年终稿,加上前期准备,可谓十年磨一剑。书中所表现的鄂伦春人那种强大旺盛的生命力,那种不畏艰险、敢于搏杀的勇气,以及美好真诚的品格,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世俗之痛与灵魂之深的探勘

——李进祥小说创作论 □乌兰其木格(蒙古族)



人到中年的回族作家李进祥,在文学的旷野上已跋涉多年,可喜又可贵的是,我们没有在他身上看到很多作家显现出的自我重复和保守疲敝。恰恰相反,在近年来的小说写作中,李进祥表现出毫不懈怠的探索精神及果敢锐气的艺术魄力。长篇小说《拯救者》和《四个穆萨》《讨白》《黄鼠》《三个女人》《二手房》等一系列短篇小说作品的发表,均确凿无疑地彰显出作家试图超越此前他所惯熟的乡土题材和叙事风格的努力。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兼善,繁华都市与偏远乡村的双重书写,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的绵密编织,世俗之思与灵魂之深的探勘追问……这一切,使李进祥的小说呈现出繁复的面貌与开阔的审美意蕴。在文学创作的征程中,这种不封闭、不停滞、在路上的写作姿态本身就值得肯定和褒扬。

李进祥的作品是现实主义与先锋精神遇合的产物。他近几年创作的小说彰显出规避叙事艺术简单化的诸种努力,达到了哲学寓意的生成与叙事形式的自觉凸显。如在长篇小说《拯救者》中,作家通过一个劫持事件的发生,在大巴车这一密闭的空间内,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描写了劫持者与被动劫持者,大巴车内与网络世界中不同国度、不同性别、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人物言行举止及其复杂幽微的内心世界。多元的叙事视角与精妙的叙事结构的契合,使这部作品具有复调小说的魅性,如巴赫金所说的,“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

在研习和借鉴先锋文学艺术新变和自由精神的基础上,李进祥敏慧而巧妙地将“写什么”与“怎么写”进行了艺术的缝合。“有意味的形式”的匠心经营,颠覆了此前读者对李进祥作品的惯性认知。作家以崭新的艺术尝试成功地实现了他在创作《拯救者》之初意欲实现的目标:“写一部与自己以往不一样的作品……这部小说不光是突破了以往的作文题材,更重要的是,叙述方式、叙述语言也有很大的变化。”

但在求变与追新的同时,李进祥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作品中的恒常与坚守。不论是新近的作品,还是早期的写作,贯穿他前后创作的“草蛇灰线”是他对弱小群体的生存追问与灵魂之思。李进祥是一个对时代历史、对人类的内

心世界有着强烈探求欲望的作家。他的写作在介入现实、保持对时代的慎思的同时,充满了对广大底层民众的知情与体恤。在“清水河”系列篇章中,无论是痴恋土地、辛勤劳作的传统乡农,还是进城寻梦、忍辱负重的新型农民工,这些人物的生活阅历与生命故事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寻求理想人生的历程中都受尽了命运的捉弄,都要遭遇苦难的迎头痛击。令人称道的是,李进祥笔下的苦难并非只是底层民众面临的物质艰窘,他更注重揭示现代人类在社会转型时期遭受的精神苦难。譬如在长篇小说《拯救者》中,这些来到桃花源景区中的每个人物都陷溺在精神的愁城中,他们期望获得身体与灵魂的救赎。然而,自始至终,他们都未能走出各自的悖论性处境,依然被生活或命运所劫持。

于是,艰难时事造成了人心之殇。李进祥小说中的芸芸众生普遍经受着灵魂的孤独。瓦尔特·本雅明认为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而“孤独”是李进祥进入现代人类精神肌理的一把钥匙,也是他对存在的独到解析。在《四个穆萨》《讨白》《黄鼠》等文本中,作家不避艰险地书写了神圣信仰与世俗生活、恐怖杀戮与安顿度日、固守教规与敬畏生命的精神疑难。在历史暴力与天灾人祸中,渺小的人类在彷徨孤苦境遇中痛苦地挣扎。他们的满腹心事得不到纾解,追索也得不到最终的答案,于是孤独便成为永恒的宿命。尤其在《讨白》这部小说里,无处不在而又无休无止的孤独感笼罩着每一个人。人性与神

### 新 闻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4月2日,由鲁迅文学院主办的“穿越的语辞——帕蒂古丽、陶丽群、雍措研讨会”在京举行。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孟繁华、贺绍俊、冯秋子、宁肯、周晓枫、徐则臣、张莉、丛治辰、傅逸尘、肖贵平等作家、评论家与会研讨。研讨会由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郭艳主持。

本次论坛以“穿越的语辞”为主题,研讨了帕蒂古丽、陶丽群、雍措三位少数民族女作家的作品。维吾尔族作家帕蒂古丽近年来在小说、散文创作领域用力颇深,新作《水乳交融的村庄秘境》是深入生活结出的一颗果实;壮族作家陶丽群多年来进行着别具风格的小说创作,《母亲的岛》《寻暖》等作品引起较好反响;藏族作家雍措则长于散文写作,其笔下的“凹村”逐渐成为具有独特精神意义的地理坐标。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坚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围绕三位作家的创作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尤其提出了很多一针见血的意见,让几位青年作家受益匪浅。

这几位作家笔下的“穿越的语辞”,既与她们的少数民族身份有关,也来自于她们的思维和语言习惯。大家谈到,三位作家基于民族身份和文化经验写作,以各自鲜明的风格标识了各自独特的存在,也在更广大层面上对我们普遍关注的命题进行书写与探讨。散文集《水乳交融的村庄秘境》是一个在新疆生长的作家离开多年后又回归的创作,作为一名援疆干部从宁波回到新疆,对故乡土地上的人、物、事有了新的发现和体悟。这些作品弘扬民族团结的理念,对乡村土地的爱、人生存于世的基本善念等,从细微处着笔用墨,彰显了对不同民族间沟通交流的深刻理解和认知。相比较前三部分,散文集第四部分的一些篇章略显随意,影响了整部文集的力度和深度,陶丽群的小说含蓄迂回,在扎实、紧凑的结构中,追求小说的复杂意蕴,以精准的文字、淋漓尽致的表达,给人带来新鲜感。她的小说耐人寻味,于空白处让人想象、思索。作为一名女作家,陶丽群关注的是处于正常生存状态中的女性的状态与情感,《母亲的岛》《寻暖》等篇什向深处开掘,以细腻饱满的情感向读者呈现了一个独特的女性世界。但也有评论家认为,思想深度不够使得小说不够深刻,从而限制了更大张力的形成。提到雍措的散文,与会者认为,她在“凹村”完成了一种有灵性的书写和表达,雍措的散文体现出了“万物有灵”的世界观和生命观。在她的作品中,动物、墙、风都能进行拟人化的交流,产生一种“鬼使神差”的魔幻效果。作家对各种生命力的介入信手拈来,找到了特殊的角度、素材、语调,进行了自由的表达。与此同时,大家也谈到,雍措的散文中,关于景物的描写较多,关于人物的近景和特写则较少,在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上时有困顿之感。但相信假以时日,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和克服。

## 鲁迅文学院论坛研讨 三位少数民族女作家的『穿越的语辞』